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1.004

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金美杰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韦护》本质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由于时代的“误读”以及丁玲的多次修改,《韦护》的“自叙传”色彩被长期遮蔽。通过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分析其从初刊本(1930年)到最后改定本(1981年)之间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这部一度被定位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仅真实记录了丁玲早年的思想与情感经历,更以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见微知著地呈现了20世纪动荡的时代语境中丁玲丰富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丁玲;《韦护》;自叙传;版本修改;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2)01-0025-08

引用格式:金美杰.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1):25-32.

“Autobiography” Nature and Version Modifications of Ding Ling’s Novel *Wei Hu*

JIN Meij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ei Hu* is essentially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Due to the “misreading” of the times and Ding Ling’s many modifica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 of *Wei Hu* has long been obscured. By reading the first edition of *Wei Hu* carefully and comparing different versions from the first edition (1930) to the finally revised edition (1981),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is novel which once regarded as a literary work of “revolution plus love”, not only truly records the early process of thought and emotion, but also presents the rich mind world of Ding Ling in the turbulent 20th century by the history of version modifications spanning more than 50 years.

Keywords: Ding Ling; *Wei Hu*; autobiography; version modifications; mental process

在丁玲的创作史上,《韦护》是一部被认为具有“公式化”倾向的评价较低的长篇小说。由于《韦

护》发表时正值“革命加恋爱”的“普罗”小说风靡文坛之际,也因为《韦护》的确写到了革命

收稿日期:2021-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本土化研究”(19BZW103)

作者简介:金美杰(1993—),男,湖北潜江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性别文化与文学。

者在恋爱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因此小说一经发表就被定位为一部表现革命与爱情冲突的作品,这种看法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丁玲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评价,她反驳称《韦护》的创作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公式毫无关系,自己仅仅想写五卅运动前的几个朋友^[1]。以此为切入点,近年来有多位学者从丁玲与《韦护》的主要原型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出发,结合不同时期丁玲对瞿秋白的书写,考察“丁玲意识倾向在‘政治’与‘文学’的张力场中的波动和迁移”^{[2]169},或者探究丁玲“将革命、主体与文学融汇一体的独特辩证法生命哲学”^[3],抑或是透视“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4]。这些成果跳出了“革命加恋爱”的窠臼,以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理论洞见为《韦护》的阐释与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尤其是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一文,不仅注意到了《韦护》的版本修改问题,更结合《在黑暗中》《韦护》《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多个文本,紧紧扣住丁玲主体结构的二元性这一论题,深入探讨了丁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多个关键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回顾《韦护》的已有研究以及丁玲不同时期的创作谈,笔者发现其中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首先是《韦护》与生活原型的关系问题。《韦护》取材于丁玲早年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爱情生活已无疑义^[5],然而,只要稍微熟悉瞿、王二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丁玲对所谓“朋友生活”的书写并不忠实。既然丁玲反复声称自己只想写出朋友的生活,为什么完成后的小说却与真实的历史原型发生了明显的偏差?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已经足够凄美动人,丁玲为什么没有如实加以呈现,而偏偏书写了一个充满矛盾、困惑与挣扎的故事?

其次是关于《韦护》的版本问题。《韦护》自1930年发表以后多次再版,在此过程中,丁玲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目前通行的《韦护》版本已经与初刊本具有较大差别。笔者共找到9个版本的《韦护》,分别为:1930年1—5月连载于《小说月报》的《韦护》初刊本;1930年9月15日上海大江书铺出版本;1931年3月20日上海美丽书店出版本(该书版权页标有“1930 8 15 初版,

1931 3 20 再版”字样,但1930年8月初版本笔者未见);1931年12月2日上海大江书铺再版本;1938年7月开明书店出版本;1941年6月30日新京书店出版本;1981年7月收入《丁玲中篇小说选》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本;1983年经过陈明修订收入《丁玲文集》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本;2001年以《丁玲文集》版本为依据收入《丁玲全集》的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笔者逐一比对后发现,其中1941年和1981年《韦护》版本改动较大。1941年《韦护》版本主要删改了涉及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是为修改本;1981年《韦护》则在1941年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删除了珊珊的爱情线索以及对韦护的负面书写,是为丁玲本人最后改定的版本,此后的《韦护》均以此版本为依据再版或者收入丁玲相关文集。因此,本文主要依据1930年初刊本、1941年修改本以及1981年改定本为依据进行讨论。对于《韦护》的版本修改,不仅大多数研究者缺乏重视(前述贺桂梅的文章有部分涉及,但由于该文并非专门以《韦护》为探讨对象,因而对《韦护》完整的版本变迁史没有全面论述),丁玲本人也从未提及。那么,丁玲明明修改了《韦护》却又不愿公开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认为,无论是将《韦护》看作一部“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还是一本记录朋友爱情故事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忽视了《韦护》创作及修改过程中丁玲自我的主体性。《韦护》尽管创作于“革命文学”方兴未艾的1929年,书写的对象却是1922—1924年丁玲在南京、上海求学时的一段弥足珍贵的情感经历。这段经历对于丁玲而言不仅刻骨铭心,更与丁玲自我的认知与成长密不可分。因而,在《韦护》的创作过程中,丁玲倾注了强烈的情感,以至于将自己的经历和情感毫无保留地糅合进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其中,丽嘉对无政府主义由信仰到失望的经历,韦护在“新我”与“旧我”之间的挣扎,珊珊对韦护复杂暧昧的情感,无不是丁玲自身经历的隐喻,实则共同构成了五四以来丁玲的个人心灵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韦护》实际上是记录丁玲早年心路历程的一部“自叙传”小说,是进入“革命年代”的丁玲对五四的一个并不遥远的回望。此后,随着丁玲的“左转”和投身革命,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中,出于现实考量,丁玲有针对性地

《韦护》进行了数次修改，更从反面印证了《韦护》之于丁玲的“自叙传”意义。

一 丽嘉与无政府主义

丽嘉是《韦护》的女主人公，其原型是丁玲早年的挚友王剑虹。通过丽嘉理解王剑虹固然不错，但必须注意的是，丽嘉与王剑虹并非完全对应。作为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丽嘉的塑造更多糅合了丁玲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可以说，丽嘉尽管以王剑虹为原型，但其思想经历却从侧面记录了丁玲对无政府主义由信仰到失望的过程。

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于欧洲的政治哲学思潮，流派较多，但其核心主张是要求实现个人的彻底解放和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组织束缚。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至五四时期达到传播的顶峰，深刻影响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韦护》的主要原型瞿秋白、王剑虹、丁玲都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以三人交往经历为蓝本创作的《韦护》包含了丰富的无政府主义内容，其尤其体现在丽嘉的形象塑造上，但1941年修改本则有意淡化了丽嘉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份。

初刊本中的丽嘉，具有明确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她不仅废除了姓氏，还因为崇尚自由而拒绝求学或者工作，只想要每天恣意游荡，并且“常常在同一些所谓中国的安那其党人来往”^{[6]92}。（1941年修改本改为：“她是常常在同一些所谓中国的文学人来往。”^{[7]18}，令不明就里的读者不知所云）丽嘉初次见到作为“康民尼斯特”的韦护时，抱有明显的敌意，其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对此，韦护也有深刻的体察：“……她们是很误解了马克斯，是无疑。所以韦护在这些地方，总常常留心，不愿太袒护了自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6]90-91}（1941年修改本删除“误解了马克斯”这一明显标记，并且把“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改为“创作上、文学上的主张”^{[7]14}）韦护走后，丽嘉在被韦护的仪表和谈吐所打动的同时，又感到十分苦恼：“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康敏尼斯特。”^{[6]92}（1941年修改本则改为：“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

脑筋腐败的青年。”^{[7]18}）

与今天通行的《韦护》版本相比，初刊本中的丽嘉并非只知恋爱和享乐的小资女性，她的性格中更有着无政府党人除强权、争自由的“革命”血脉，与晚清文学中深受俄国虚无党暗杀行动影响的“女革命党人”形象一脉相承，正如文中所称，“丽嘉却愿将热血洒遍了人间，为的她要替人间争得了她渴慕的自由”^{[6]92}。这种类似于俄国女杰苏菲亚的强悍气质，也正是丁玲塑造的狂狷孤傲的“莎菲们”区别于忧郁病弱的“露沙”（庐隐《海滨故人》）等“五四”新女性的特质。尽管丁玲对丽嘉这个维度的性格特点表现并不充分，后来又多有删节，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个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当丽嘉托一位在南洋做校长的朋友代找5个教员的位置时，这位南洋朋友产生了误会，以为她们要来南洋从事革命活动，因而他的回信是：

近来此地政府压迫日甚，言论稍不留意，则以过激党论罪，驱逐出境（朋友中已不乏人，而你认识之本德君，亦已于昨日抵广州矣）故我等均无法施展，终日惟相对闷坐而已。故你来，我殊不赞成，以你之燥进，如来此，徒取祸耳……^{[6]100} [1941年修改本改为：“近来此地人浮于事，谋事极为困难（朋友中已不乏其人……）”^{[7]37}]

从初刊本回信看，丽嘉的这位南洋朋友显然是一个无政府党人，“过激党”是当时社会对无政府党的普遍称谓。19世纪以来，南洋长期被欧洲殖民，当地曾活跃多个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并制造了数起暗杀事件。最为著名的是来自中国的女无政府党员黄素英，1925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以炸弹暗杀南洋华民政务司，黄素英因此被国内报刊称为“中国的苏菲亚”^[8]。然而，这起暗杀事件也使得南洋政府对当地的无政府党进行了更加严厉的镇压，革命运动因此进入低潮，故才会出现该校长所称的“相对闷坐”的情形。1941年修改后的回信，则将1920年代南洋无政府主义运动受挫的时代背景改为一般的谋事困难，丽嘉的形象也就失去了原本具有的“女革命党人”的激进个性。

通过丽嘉的经历与感喟，《韦护》也忠实呈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必然走向失败的宿命。当珊珊与丽嘉发现社

会已经不允许她们再继续游荡时,珊珊抱定了读书求学这条路,丽嘉的选择则是到无政府党人醉仙那里,准备和那些“热血青年”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而,满怀希望的丽嘉看到的却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活在幻想中、丝毫没有实际行动的颓废现状。

他们徒然的背诵着克鲁泡特金的理想,徒然的讲着高妙的哲学和文艺,徒然的痛斥唯物史观,和那起集产主义者,而他们却终日无动静^{[9]569}。(1941年修改本删除)

最终,丽嘉失望地离开了无政府党人。丽嘉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逐步失望,均取材于丁玲自身的经历。丁玲在五四时期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0]。为追求自由理想,1922年,不满18岁的丁玲与王剑虹一起离开家乡,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漂泊游历。在此期间,丁玲结识了多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还曾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无政府主义追求绝对自由的激进思想与丁玲向往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小说中,丽嘉受不了庸常生活的束缚,想要去南洋、去法国甚至游荡世界各地的想法,与丁玲晚年所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诸多幻想如出一辙^[11]。茅盾曾回忆,在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时的丁玲、王剑虹、王一知都有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2]199}。1925年丁玲与胡也频结婚后,来访的沈从文发现两人的书架上都有无政府主义的书籍^[13]。然而,除了乌托邦一般遥不可及的革命理想之外,无政府主义并不能给丁玲指明真正的出路,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对组织的疏离,又使得丁玲尽管很早就结识了诸多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不愿入党,“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14]。因而,青年时期的丁玲虽然具有高度的改革社会的愿望,却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在严峻的社会形势中撞得头破血流,以至于陷入极度的苦闷和虚无情绪之中。“五卅”以后,无政府主义由于不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高效地组织工人罢工运动,更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其影响迅速式微。1927年“安国合作、共同反共”理论的提出,更使得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声名狼藉,从此,无政府主义彻底走向衰落。

1927年,丁玲在处女作《梦珂》中借助梦珂的眼光讽刺了无政府党员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在《韦护》中,丁玲更通过丽嘉的视角揭示了无

政府主义空有革命愿望却缺乏有效手段的致命缺陷。显然,丁玲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必然没落。由此观之,《韦护》不仅展现了丁玲早年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也标志着进入1930年代的丁玲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清算与剥离。在共产主义革命史上,无政府主义长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需要严厉肃清的对象。1941《韦护》修改本对无政府主义内容的删削,当是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丁玲,在延安高度体制化的文艺环境下作出的有意修改。这与新时期“复出”后的丁玲对早年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讳莫如深的态度,也是一以贯之的。

二 “一个人的战争”

《韦护》最根本的矛盾是什么?长期以来,《韦护》的核心冲突往往被阐释为“革命”与“爱情”的冲突,即韦护因沉迷恋爱而耽误了工作。在党内同志的警示下,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最终离开恋人追随革命而去。也正因如此,许多人批评《韦护》囿于“革命加恋爱”的肤浅范式,没有写出1920年代更为深刻的社会矛盾^{[12]201}。即使认同这种观点,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于韦护而言,革命与爱情为什么一定会发生冲突?或者说,丽嘉与韦护的革命工作为什么一定不能并存?对此,《韦护》的已有研究仍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从《韦护》文本来看,尽管热恋中的丽嘉非常依赖韦护,但她从来没有阻挠韦护的工作,甚至还鼓励韦护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授课。对此,韦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从韦护的原型——瞿秋白的生平来看,瞿秋白短暂一生中的两次婚恋经历都堪称完美。瞿秋白称第一任妻子王剑虹为“梦珂”,即法文“我的心”,足以证明两人的心心相印;王剑虹病逝以后,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生命的伴侣”,彼此忠贞不渝,直到1935年瞿秋白从容就义。也就是说,无论从小说还是从历史原型来看,爱情都没有构成革命的对立面。因此,如果要找到《韦护》的深层矛盾,就必须跳出“革命加恋爱”的流行看法,回到韦护本人的思想经历上来。循此思路,重读初刊本的《韦护》会发现,小说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停留在革命与爱情的层面,而深入到韦护思想转变之后的“新我”与转

变之前的“旧我”之间的博弈。也即是说，《韦护》依然延续《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心理剖析手法，其实质是呈现韦护“一个人的战争”。

为突出韦护与周围那些思想简单、生活单纯的同事们的不同，小说特意交代了韦护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有过的充满无政府色彩的生活。

“他能比他们更能浪漫，他的历史可作证，他从前为了贫苦，他有过两天没吃饭，等将最后的衣当了钱时，却将来买醉了，他为了爱情也会……”^{[6]98}后来，韦护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一名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但这种跨度相当大的转型似乎并不彻底。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于韦护而言，更像是一种强加的纪律要求，而远没有内化为韦护的精神自觉。初刊本《韦护》多处表现了革命工作之于韦护的“强迫性”。例如，小说一开篇就表现了韦护与同事的抵牾。

他觉得中国的这班人，这所谓同志，所谓康敏尼斯特，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能固执^{[6]85}。（1941年版本将“中国的这班人，这所谓同志，所谓康敏尼斯特”改为“现在的一般学者”^{[7]1}，此处修改亦十分生硬，与后文严重脱节）

纵观整部小说，革命工作似乎从来不能带给韦护真正的慰安，与工作相关的永远是激烈的争吵、身体的消耗以及难以应对的人事关系，工作中的韦护就像一匹勉强负重前行的老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来到丽嘉住处的韦护，他在一群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女性中间高谈阔论，左右逢源，并一举俘获了在座女性的倾慕。这样看来，小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两个“韦护”。一个是现在的、已经转变为“康敏尼斯特”的韦护，一个是过去的、充满小资情调和颓废色彩的韦护，尽管后者更符合韦护的个性，却不断被前者所压抑。

丽嘉的出现，则使得这种压抑变得无效。作为无政府主义女性的丽嘉，与出现于1920年代末文坛的一大批革命女性如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茅盾《蚀》三部曲）、王曼英（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余玥和余彬（白薇《炸弹与征鸟》）同属一个女性谱系。她不仅美艳性感，更自由洒脱、热力十足，像一团正在燃烧的滋滋作响的火球，烧毁了韦护精心装饰的面具，也唤醒了韦护内心最真实的自我，也就是他需要时刻压抑的“旧我”。

在与丽嘉恋爱同居之后，韦护的变化让熟悉他的人感到难以置信。他恨不得再也不到办事处去办公，编刊和授课也都变得难以承受，他只想每天和丽嘉关在小屋里甜蜜相拥。他给丽嘉买精致的点心和高档的长筒丝袜，吸吮丽嘉唇边溢出的红酒，甚至亲吻丽嘉的小脚。恋爱中的韦护，就像他颇为欣赏的玩世不恭、放纵原欲的虚无主义者“沙宁”（阿尔志跋绥夫《沙宁》），甚至颇具《长恨歌》“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享乐主义色彩。也就是说，只要和丽嘉在一起，韦护原本需要彻底清算的“旧我”就会复苏，甚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韦护之所以必须离开丽嘉，根本原因不在于“爱情”本身会妨害“革命”，而在于丽嘉恰恰构成了韦护“旧我”的一种镜像，使得韦护时刻处于“两个自我”不断交战的分裂状态，并时刻有颠覆“新我”的危险。

丁玲为什么会塑造出这样一个分裂性的人物形象？其中固然有原型人物瞿秋白的影子（1935年，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也的确反省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15]），但据此就认为《韦护》“写出了瞿秋白的双重身份和二重人格”^{[2]171}恐怕并不确切。写作《韦护》时的丁玲才25岁，也还没有参加革命，对瞿秋白作为革命家的一面知之甚少。无论是从人生阅历还是从与瞿秋白交往的深度看，1929年的丁玲都还没有能力深入把握并呈现“书生革命家”瞿秋白的复杂人格。只有亲身在革命生涯中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之后，丁玲才较为全面地理解了瞿秋白。对此，丁玲自己也并不否认。丁玲晚年这样回忆《韦护》对瞿秋白表现的不足：“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的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16]49}丁玲的反思无疑是十分诚恳的，这也是为什么《韦护》的革命书写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彻底失败的^[17]的原因。

那么，“韦护”这个描写失败的“革命者”形象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与其说韦护写出了瞿秋白的二重人格，倒不如说其隐喻了丁玲思想转型之际的矛盾状态。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形势急转直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居上，以及胡也频的“左倾”影响，丁玲开始放弃强烈的个人自由追求，逐渐接受了列宁式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1930年代之际,丁玲在思想与创作上出现了所谓的“向左转”现象。然而,作为“五四之女”,此时丁玲的精神血脉仍是五四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无论是丁玲所接受的个人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都在根本上指向“个人”。在从“人的解放”到“阶级革命”的巨大跨度中,丁玲无法调和新的“阶级话语”与旧的“个人话语”之间的矛盾抵牾。诚如贺桂梅指出:“丁玲的‘革命’毋宁更瞩目于历史中的‘个人’,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表达的激情。”^{[3]24}富有趣味的是,从后来的革命生涯来看,丁玲也始终难以完全融入革命体制,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五四的启蒙话语与女性立场。当革命与民族国家话语日益变成一种“大话”^[18]覆盖了个体的生命经验,集体解放运动也就“很难避免在其内部复制压迫性机制”^[19]。丁玲必然为自己的“小话”付出沉重的代价,1942年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遭受的一系列批判即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转型之作的《韦护》并不意味着丁玲从“五四”成功跨越到了“革命”,而是预示了此后置身革命中的丁玲在个人与集体、女性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在丁玲来到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圣地延安之后,更为集中地展现了出来。

三 复杂难解的情感

丁玲一生的不同阶段都曾写到瞿秋白,《韦护》是其中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瞿秋白生前阅读过的“瞿秋白书写”。1980年代初,“复出”后的丁玲对《韦护》再次进行修改,主要删除了珊珊对韦护的爱情以及一些明显有碍于韦护正面形象的内容;同时,丁玲亦通过写作《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韦护精神》等回忆性散文,对“韦护”形象进行了全新的定位与阐发。由此观之,《韦护》及其修改过程,实则蕴含了丁玲对瞿秋白跨越半个世纪的复杂情感。其中,既有丁玲初识瞿秋白时朦胧的爱恋,也包含了王剑虹病逝后丁玲对瞿秋白的怨恨,更有遭受政治污名后的丁玲对瞿秋白新的理解,以及新时期以来与瞿秋白平反进程纠葛在一起的丁玲的自我辩护心态。

关于丁玲对瞿秋白的爱情,已有研究者从两

人的交往层面进行过精彩的索解。实际上,这段丁玲不愿公开的感情,在小说人物珊珊的身上亦有着极为细腻的展现。《韦护》中,珊珊与丽嘉、韦护的关系,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丁玲之于王剑虹、瞿秋白的关系。珊珊热爱文学并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的经历,也与青年时期的丁玲相仿。更为明显的是,1981年丁玲将《韦护》中所有涉及珊珊爱情心理的内容删除殆尽,则从反面印证了珊珊的内心活动正是打开丁玲早年情感历程的窗口所在。与改定本不同的是,在初刊本《韦护》中,珊珊与丽嘉几乎同时对韦护产生了好感,后来得知丽嘉深爱着韦护时,珊珊的内心非常复杂,对此,《韦护》有一大段珊珊的内心独白:

……她实在应能比较接近韦护,她也正是受着一种模糊的人格上的吸引,才跑到这里来念书的。谁知现在她朋友却更其不让的也在这人身上感起趣味来……这实在有点使她不高兴……^{[20]384}(1981年改定本删除)

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珊珊对韦护的爱以及对丽嘉的不悦。对此,丽嘉不仅无知无觉,还把珊珊当作了分享自己爱情的最忠实听众。对于珊珊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她答到:

“……我看你是一直从转来到这时,他影儿都没离开你脑子的。”说到这里她便笑,用手去抚摸丽嘉,但她却咽住了这句感伤的话:“唉,我何独不然!”只接下去:“这真不值得!”^{[20]385}

1981年改定本唯独删掉了“唉,我何独不然!”这句话^[21],而恰恰是这句话透露了珊珊只能把爱情埋在心里、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无奈处境,丁玲修改目的之明确由此可见一斑。比起爱情,珊珊显然更加珍视她与丽嘉的友情,她时刻担心她们之间会上演“两女争一男”的庸俗言情故事,以至于三人最终都陷入悲剧结局。因此,当丽嘉与韦护相恋并同居时,珊珊选择了退出,她真诚地祝福丽嘉:“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幸福,他好好的永远的爱你就好……你是太可爱了。若果他还要丢掉你,那他只是傻子。”^{[9]577}这段带有“成全”性质的祝福语,与丁玲晚年所回忆的她曾对瞿秋白说过的话异曲同工。在把王剑虹的情诗交给瞿秋白之后,丁玲同样祝福瞿秋白:“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16]39}1981年改

定本删除了这条感伤的爱情线索，简化了人物之间的情爱关系。与之对应的是，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中，丁玲回忆这段感情时，也刻意回避了自己对瞿秋白的爱情，只将自己叙述成一个牵线搭桥的角色。显然，晚年的丁玲已经不愿再提及早年的自己与瞿秋白之间微妙的情愫。（其缘由可能也与1980年丁玲严正驳斥沈从文《记丁玲》对自己早年感情生活的夸张叙述有关。毕竟，不明就里的看客很容易将原本高贵纯洁的感情庸俗化，将情感丰富的女性叙述成香艳小说的女主角，这也是女性意识甚为强烈的丁玲所深恶痛绝的。）然而，正如丁玲之子蒋祖林所说，在丁玲欲说还休的文字中间，还是留下了她和瞿秋白曾经有过非同寻常的感情的痕迹^[22]。

除了这份短暂并始终保持沉默的爱情，《韦护》同样见证了王剑虹病逝以后丁玲对很快再婚的瞿秋白的怨恨心理，正是这种怨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丁玲对韦护的塑造绝不会太过“光彩”。初刊本中，韦护虽然是一个革命者，但他不仅满脑子小资情调，在感情方面更是一个阅女无数、到处留情的轻薄男子。丽嘉与韦护相恋之前，丁玲就通过珊珊的观察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他一定不知有多少次会玩弄过女人，也会被许多女人宠幸过。而她朋友呢，太天真了，太热情了。她虽说被爱过，然而那些爱都从没有喊醒过她幼稚的心。现在呢，他太聪明了，所以她一定会跌下去，而他自然可以飞起^{[20]386}。（1981年改定本删除）

珊珊的眼光无疑是相当敏锐的。丽嘉年仅20岁，性格单纯，又没有固定职业，一旦陷入恋爱，爱情几乎就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与之相比，韦护不仅是一个资历较深、交际广阔的革命者，而且情史丰富，非常擅长俘获女性的芳心。初刊本《韦护》中，韦护不仅时时用满含情欲的目光凝视女性的身体，也时时流露出放纵欲望、玩弄女性的浪荡心态，甚至在喝完闷酒后“几次想跑到一些卖淫妇那里”^{[19]567}。韦护对丽嘉的追求更体现了高超的欲擒故纵手法。在明知丽嘉已经爱上自己时，韦护故意很长时间避开丽嘉，以静待动。此时丽嘉由于对无政府团体失望，加之在朋友处也受到

了冷落，孤独迷惘的她把擅长探讨人生的韦护看成了最值得信赖的人，甚至有意识地向韦护的革命工作靠拢，协助共产主义者进工厂引导女工罢工。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个革命者，韦护非但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引导丽嘉，反而趁此“良机”将丽嘉进一步引入爱河。丽嘉最后会完全沉迷于狭小的二人世界，韦护实在难辞其咎。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丽嘉离开韦护的住处后，面对房东太太的追问，韦护竟然这样为自己辩解：

“……不过我可以说，都是她在勾引我呢。”
他看见那妇人的脸上显出了一道鄙视的光……^{[19]574}
（1981年改定本删除）

这种罔顾事实、污蔑女性人格的自我辩解，体现了韦护自私、虚伪的一面，也直接加剧了房东太太对丽嘉的厌恶，她甚至以为丽嘉是一个暗娼。日后丽嘉再到韦护住处时，要时时面对房东“闪闪逼人”的眼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说结尾，韦护在离开以后寄给丽嘉的信中，反省了自己的物质与市侩，反思了自己的二重性人格，但始终没有真正忏悔对丽嘉所造成的心灵伤害。这种性别层面自省精神的匮乏，正是五四新文学中男性形象的共同特征，实则体现了男性主导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性别维度的重大缺陷。

在1981年改定本《韦护》中，丁玲删除了这些明显负面的书写，使得韦护的形象相比于初刊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洁化”和“美化”。究其原因，应当有二：一是经历了诸多人生坎坷之后的丁玲对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婚姻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与理解，心态早已平和；二是为了瞿秋白的平反与正名。瞿秋白曾经因为其牺牲前在狱中留下的绝笔《多余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遭到误解。1981年，丁玲利用重版的机会修改《韦护》，其直接原因应当就是她担心瞿秋白的形象再度被大众误解。

然而，即使经过这番修改，小说中这个颇具小资色彩的“韦护”形象也完全称不上伟大，与丁玲1980年代所赞扬的如韦陀菩萨一般的“韦护精神”^[23]仍有较大落差；但也正是这种落差，让今天的研究者得以窥见丁玲企图将自己的作品，与瞿秋白作为伟大革命家的一面联结起来的努力。究其根本，乃是丁玲渴望借助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瞿秋白的遭际与威望，来为自己的政治纯洁性

进行辩护。众所周知,丁玲漫长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毁誉参半,曾被国民党囚禁南京的经历一直是丁玲政治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1942年前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中丁玲为此备受折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丁玲被划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并被打成“右派”,逐出文坛长达20余年。“文革”结束后,由于周扬的阻挠,丁玲的平反工作迟迟得不到彻底落实。以此观照新时期丁玲对《韦护》的修改会发现,丁玲对“旧作”的修改,实际上与“新作”(《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韦护精神》《早年生活二三事》等)的创作一样,有着为瞿秋白与自己辩诬的双重诉求。时过境迁之后,比起初刊本《韦护》所包含的真挚的青春激情,晚年的丁玲显然更愿意将瞿秋白塑造为一个最值得怀念的革命导师,以及和自己一样虽然长期被误解但始终保持忠诚、无怨无悔的中共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韦护》的此番修改,一方面体现了经历过半世沧桑之后的丁玲终于彻底理解了瞿秋白,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遮蔽了初刊本《韦护》所留存那段特殊的青春印记。

《韦护》尽管以丁玲的挚友为原型,但对他人故事的书写并不能掩盖文本内部的“自我表现”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韦护》实际上是丁玲的一部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自叙传”小说,真实记录了早年的丁玲思想与情感经历。由于历史的错位,《韦护》发表以后被普遍看作一部表现“革命加恋爱”的普罗小说,再加上后来在多变的时代语境中丁玲对《韦护》所进行的数次修改,由此导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被完全遮蔽。通过文史互证,不难发现丁玲的几次修改,均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而与提高小说的艺术水准基本无关,部分修改甚至还造成了文本细节上的漏洞。只有抛开文学史的成见,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并理清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才能够真正读懂《韦护》之于丁玲的独特意义,以及在“流动”的文本背后丁玲隐秘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 [1]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M]//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
- [2] 秦林芳.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J].江苏社会科学,2013(6).
- [3] 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5).
- [4] 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J].文学评论,2015(2):71.
- [5]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28-36.
- [6] 丁玲.韦护[J].小说月报,1930,21(1).
- [7] 丁玲.韦护[M].长春:新京书店,1941.
- [8] 佚名.中国的苏菲亚:黄素英的一生[N].学汇,1925-03-09:1-5.
- [9] 丁玲.韦护[J].小说月报,1930,21(3).
- [10] 张全之.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6):150-155.
- [11] 丁玲.我是人民的女儿[M]//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06.
- [12]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艺月报,1933,1(2).
- [13] 沈从文.记丁玲[M].长沙:岳麓书社,1992:67.
- [14] 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M]//丁玲.丁玲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9.
- [15] 瞿秋白.多余的话[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56.
- [16]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M]//丁玲.丁玲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17] 谿山,萧石,殷干.读者顾问:丁玲:一个时代的烙印:韦护之内容与技巧[N].文艺新闻,1931-08-10(4).
- [18] 丁玲.“三八节”有感[M]//丁玲.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3.
- [19] 冷嘉.大风雨中的漂泊者: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说起[J].文学评论,2012(2):38.
- [20] 丁玲.韦护[J].小说月报,1930,21(2).
- [21] 丁玲.韦护[M]//丁玲中篇小说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96.
- [22] 蒋祖林.丁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57.
- [23] 丁玲.韦护精神[M]//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1.

责任编辑:黄声波